DOI: 10.13613/j.cnki.qhdz.000872

2001年第4期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4 2001
第16卷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16

武王克商之年研究的纠葛

彭 林

(清华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 武王克商之年是解决夏、商、周年代的关键,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的探索,得出了44种不同的结论,极形纠葛。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再度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将诸家的研究,依其引据的史料以及研究途径的不同分为六类,分别作了分析,并论述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久讼不决的原因。

关键词: 西周; 武王克商; 年代学; 铜器断代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62(2001)04-0035-07

我国古史的确切纪年,只能上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共和以前的夏、商、周三代有王无年,成为古文明研究中的重大缺憾。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的分界,确定这一年代,方可推排西周前期的王年,并上探殷商纪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西汉以来,古今中外的年代学者无不致力于此。但是,研究者所得到的结论却是相当歧异,已有44种之多[1],极形纠葛。研究种种异说出现的原因,寻找症结之所在,是解决克商之年的基础。

一、历代学者推求克商之年的途径

就历代学者所得克商之年的长短和推求方法而言,可大别为三类,一类是长年数的,即以历术推步为主得出的从公元前1127—1066年诸说;另一类是短年数的,即以古本《竹书纪年》西周积年为257年为主得出的以公元前1027为中心的诸说;最后一类是以铜器历日与《武成》等文献相印证、年代介于以上两类之间的诸说。细分之,可归纳为如下六类。

(一)以历术推步为主的诸说

最早试图解决克商年代的,是秦汉之际的殷历家,他们用殷历推算出文王受命之年,再进而推求克商之年,有关的记载见于汉代的纬书。《周易·乾凿度》云: "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郑玄注: "受命后五年乃为此。"殷历以七十六岁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共一千五百二十年。《乾凿度》所给天元为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以之除一纪的年数,得一千八百十五纪,尚余四百八十年。再以四百八十年除以一蔀之年,得六蔀余二十四年,所以是入第七蔀戊午蔀的二十四年。这一结果与《乾凿度》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之说相差五年。《毛诗·文王》孔疏云: 天元之尾数"当云二百八十五岁",因篇中已明言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故略其残数,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戊午蔀二十四年加五年为二十九年,是殷历家推算的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克殷之年与文王受命之年相隔十三年,按照纬书殷历甲寅元推算,文王受命之年为公元前1083年,受命后十三年武王克殷,则入戊午蔀四十二年,即公元前1070年。

刘歆用三统历推勘殷历,发现其历日均后天一日,是一种不合于天的历法,所以其结论不可据信。刘歆认为,上元至伐纣之年共十四万二千一百九岁,岁在鹑火张十三度,用三统历推之,伐纣年在公元前1122年。刘歆又验之于《书序》《大传》及古文《武

收稿日期: 2001-05-18

基金项目: 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96/923)

作者简介: 彭林(1949-),男,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成》所记年和历日天象 ,认为一一相合。[2]

唐开元九年 ,一行奉诏制新历 ,因撰《大衍历议》。一行认为 ,“ (刘歆)三统以己卯为克商之岁 ,非也”。[3]他将《竹书纪年》的纪年与《武成》历日相参证 ,以康王十一年岁在甲申作为定点 ,再用大衍历推算 ,认定克商之年应该是庚寅 ,即公元前 1111年。

清人姚文田《周初年月日岁星考》用颛顼历推克商之年 ,以古本《纪年》“十一年庚寅 ,周始伐商”[4]为基点 ,下推《召诰》、《洛诰》、《顾命》、《毕命》所记周初年代 ,认为无不吻合。又从颛顼历的第三纪 (甲午岁正月甲寅朔立春为起点)“下推八百二十一年 ,入甲寅蔀第四章第四年 ,岁在甲戌 ,”两者相合 ,认为甲戌 (公元前 1067年)为克商之年。

董作宾《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认为 ,虽然殷历不精确 ,但只要消除其误差 ,即可求得正确的克商之年。他从殷历产生于公元前 370年左右、每 300余年即先天一日的原则出发推定其误差 ,然后在殷历家所定克商之年的附近寻找适合月相说 (死霸为朔 ,生霸为望)的年代和历日。他采用刘歆的殷周积年 (殷 629,周 867),又采用一行的伐纣年月 ,认定殷亡于帝辛 64年 ,即公元前 1111年。

张汝舟《西周考年》认为 ,中国最早使用的历法是“天正甲寅元”的殷历 ,即见存于《史记。历书》所载的《历术甲子篇》,他据此编撰《西周经朔谱》,推算出克商之年为公元前 1106年。

唐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认为 ,殷历的年代比较可靠 ,故以此年为基础 ,将《竹书纪年》中的商周积年调整为商 504年 ,周 820年 ,考定克商之年为前 1075年。

谢元震的《论武王克殷年代》,以周历推克商之年 ,得公元前 1127年 ,比刘歆所定克商之年更早。由于此年于文献无证 ,谢氏遂改古本《竹书纪年》西周积年 257年为 357年。

(二) 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依据的诸说

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原本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 ,记载古史年代甚多 ,故历来为史家所重。《竹书纪年》云“自武王灭殷 ,以至幽王 ,凡二百五十七年。”[5]梁启超《最初可记之年代》一文 ,最早用这一纪年来推周初之年 ,他以春秋的始年公元前 770年与西周积年 257年相加 ,得公元前 1027年 ,定此年为周武王元年。

雷海宗《殷周年代考》认为 ,《鲁世家》所记鲁公年数为 156或 157年 ,加上共和 841年 ,得 997或 998年 ,则成王元年在 1020年左右 ,证明 1027年说大致近是。何炳棣《周初年代平议》认为 ,《鲁世家》的鲁公年数与古本《竹书纪年》257年之说都有高度的可靠性 ,两者相加 ,证明梁启超之说的可信。莫非斯《西周历朔新谱及其他》、陈梦家《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对文献所见的西周王年作了累计 ,并对文献失载的王年作了推求 ,两者相加所得之数 ,与古本《竹书纪年》257年基本一致。

高本汉的《殷代的兵器与工具》,累计《鲁世家》的鲁公积年得 157年 ,加共和元年 841年 ,得 998年 ,再推伯禽在位 22年 ,武王在位 7年 ,三者相加得公元前 1027年。高氏还对文献所载及失载的西周历王之年作了推算 ,认为古本《竹书纪年》257年说不误。屈万里《西周史事概述》所论 ,与高本汉略同。

周法高《西周年代考》认为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得到的公元前 1028年只是武王成君之年 ,成君后 11年才克商 ,故克商之年为公元前 1018年 ,如此 ,方可合于《武成》、《召诰》、《洛诰》的历日天象。

劳幹的《殷周年代的问题—— 长期求证的结果及其处理方法》认为 ,《竹书纪年》固然是可信的史料 ,但据此得出的公元前 1027年说 ,不仅与真古文《武成》的历日不符 ,而且与甲骨文五次月食的年代不符。他将年代调整为公元前 1025年 ,则“与天象密合无间” ,“对于每个月食都可以不改日期直接适应”。他认为 ,之所以有两年之差 ,一是周历建子 ,《竹书》建寅 ,而牧野之战在周历年初 ,改为建寅就有一年之差;二是平王东迁不是在元年 ,而是在二年 ,《竹书纪年》将平王元年归入西周最后一年 ,故又有一年之差。减去这两年之差 ,则古本《纪年》所记西周的实际积年为 255年 ,克商之年为公元前 1025年。

黄宝权、陈华新的《周武王克殷年代考》认为 ,克商之年当以幽王的亡年公元前 771年为起点 ,加古本《竹书纪年》257年 ,为公元前 1028年。但是 ,依《国语》“岁在鹑火”的记载 ,则克殷之年为酉年 ,而与公元前 1028年最接近的酉年是公元前 1032年。岁星的周密率为 11. 8622,每隔 86年便误差 1年 , 257年的岁差正好为 3年。以 1032减去 3年误差 ,为公元前 1029年 ,此即克商之年。

(三) 累计王公之年或周代积年的诸说

《史记。鲁世家》有从第二代鲁公考公起、至隐公的十二位鲁公的纪年 ,仅阙第一代鲁公伯禽之年。刘歆《世经》云伯禽在位 46年 ,而其余鲁公之年与《鲁世家》互有异同 ,故学者多有通过累加鲁公之年推求克商之年者。由于各家对《鲁世家》、《世经》的取舍不同 ,计算的方法也不同 ,故结论仍多歧异。

林春溥在他的《古史考年异同表》中,将共和元年定为厉王 37年,再加《史记》鲁公积年 156年以及《世经》伯禽在位 46年,得公元前 1047年克商。王保德在《书经·武成篇之生霸死霸及武王伐纣的年代月日考》中,将考公至共和各鲁公之年相加,再加伯禽 46年,共得 202年,再与共和元年 841相加,得 1043年,他认为此年为文王元年,再上推 7年得公元前 1049年,为伐纣之年。

今本《竹书纪年》有西周历王的年代,累加之得 280年,据此,公元前 1051年(庚寅)为伐纣之年,公元前 1050年(辛卯)为克商之年。林春溥《古史纪年》、李兆洛《补历代建元篇》均同此说。

此外,杂采史书纪年为说者也为数不少。有些学者是通过累加西周历王之年来推求克商之年的。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一书,原有西周列王在位年数,《史记·周本纪》裴氏《集解》云:“皇甫谧曰: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此乙酉即公元前 1116年。荣孟源《试谈西周纪年》,主要根据金文,逐段推出列王年数,求出克商之年为公元前 1055年。

萧子显《南齐书·祥瑞志》引谶曰“周文王受命,千五百岁,河洛出圣人,受命于己未,至丙子为十八周”,推周灭殷后享祚 780年,东周亡于公元前 256年,两数相加,得公元前 1035年为伐纣之年。方善柱《西周年代学上的几个问题》认为,萧子显相信“周灭殷后七百八十年”之说,所以将晋和刘宋的纪年压缩了 6年,以保持周灭殷到建元元年为 1059年之数。此外,今本《竹书纪年》云“武王灭殷,岁在庚寅,二十四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又据武王克殷后在位三年之说,合计之则克商之年在公元前 1030年,是年岁在鹑火。

高木森的《略论西周武王的年代问题与重要青铜彝器》,采用古本《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之说,以隐公元年(前 722年)为基点,加 257年,则考公元年为公元前 996年。伯禽受封于成王元年,加伯禽在位 46年,则成王元年在公元前 1046年。据《何尊》,成王元年是在周公摄政 7年之后,此前还有武王克商后在位的 2年,所以伐商之年在公元前 1051年,克商之年在公元前 1050年。叶慈《三代年表》认为,《竹书纪年》一书在“发现、整理和流传过程中经常被篡改”,该书西周积年为 257年的记载仅仅是孤证,很难取信。所以,他根据《尚书》、《竹书纪年》、《史记》、《汉书》以及某些铜器,将共和以前西周列王之年重新排谱,其总积年为 209年,从而推定克商之年为公元前 1050年。

刘恕《通鉴外记》、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参酌诸说定列王年代,虽互有歧异,但积年均为 352年,故所得克商之年同为公元前 1122年。李丕基的《武王克殷年月考》,以金文与古籍参照核订,推定列王在位年数:武王 3年、成王 14年、康王 26年、昭王 19年、穆王 28年、恭王 20年、懿王 25年、孝王 15年、夷王 16年、厉王 37年,总计 203年,与公元前 841年相加,得公元前 1044年,是为武王克殷之年。

吉德炜《晚商的绝对年代》认为,由于所掌握的史料不充分,而且模糊不清,要解决克殷之年很困难,但有两点可以依据:一是利用 Robert. R. Newton的《公元前 1500年至公元前 1000年月食典(附安阳见食推定法)》,可知武丁时期的四次月食发生在公元前 1198年到 1180年的 18年中;二是根据 Bishop的研究,西周列王的平均在位年数为 20年,将此结论运用于共和元年以前的十个周王,得出武王伐纣在公元前 1040年。

(四)回推克商天象的诸说

最早用天象来解决克商年代问题的是刘歆,他用三统历对《国语》“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的记载作了具体推算,以印证其公元前 1122年克商之说。

近代学者中最早用天象来推定克商之年的是董作宾、刘朝阳先生。刘朝阳在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的出路》中提出的天象,有《尚书·胤征》的仲康日食、《左传》昭公 17年所引《夏书》日食、《诗·小雅·十月之交》的日食、《左传》和《国语》所记岁星及其位置、武丁卜辞中的五次月食等。刘朝阳还对文献中某些含义晦涩的记载作了新解,有些则作了年代推算,如《逸周书·小开解》“惟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他认为是文王 35年的月食记载,时在公元前 1137年 1月 29日。他推定《十月之交》的日食为公元前 776年 9月 6日。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都有关于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开元占经》记作“懿王元年天再启”,意思相同。刘朝阳认为这是一次发生在公元前 926年 3月 21日天明时的日全食,地点在安阳。卜辞中的“三焰食日”,他解释为日珥,时在公元前 1302年 6月 5日乙卯。

关于懿王元年天再旦,董作宾推定为公元前 966年 5月 12日,南郑时 4时 31分 58秒日全食。但是,刘朝阳所推的日食,日食点在非洲,中国看不到;而董氏的公元前 966年日食,全食带起自关岛北,中国连偏食也看不到。60年代,方善柱在《西周年代学

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根据奥泊尔子(Oppolzer)的《交食图表》(Canon of Eclipses)推算,懿王元年的日食应是公元前 899年 4月 20日的环食,地点在南阳附近,所以很快传到懿王之都南郑。其后,葛真的《用日食、月相来研究西周的年代学》,据奥泊尔子《日月食典》(Canon der Finsternisse)计算,认为有两种可能: 1. 公元前 925年儒略历 9月 3日(格里历 8月 25日)(子正的)九月丙戌朔,8时 06分可见极大食分(0.81); 2. 公元前 899年儒略历 4月 21日(格里历 4月 13日)(子正的)五月丁亥朔,5时 18分开始日食,最大食分 0.97 两次日食,在西郑(今陕西凤翔、岐山之间)都可以看到。

商王武丁时期有五次月食的记载,对于推定武王克商的年代有重要价值,董作宾最早注意及此。他将五次月食发生时的干支排列为甲午、己未、癸未、壬申、乙酉,测得其绝对年代分别为公元前 1373年、1311年、1278年、1282年、1279年。陈梦家认为,癸卯、乙酉两次日食的干支,卜辞原缺,为董氏所补,可以不论,另三次月食的时间则,则可能分别为公元前 1229、1218、1183年。

张钰哲、张培瑜的《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从寻找岁在鹑火、五星会聚、哈雷彗星、伐纣月相等四种天象的结合点来推求克商之年。他们认为,《新论》等文献关于武王克商时"五星聚"的记载是可信的,并统计分析了两千多年间的五星会聚的情况,"只有前 1059.5.28这一次,会聚的角度最小(仅 6度),几成一线,又适值甲子日,并且会聚的位置又明朗可见",与《新论》相符。认为伐纣所见的彗星即哈雷彗星,据此,他们从公元 1910年 4月 19日哈雷彗星最后一次出现逆推 40次,至公元前 1057年 3月 7日的哈雷彗星回归近日点,"视见情况与《淮南·兵略》的记载也很符合。……不仅'岁在鹑火',而且在向牧野进军及癸亥夜陈时岁星当空、昏见东方,明朗醒目,也符合利簋'岁星当空'及'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的说法",认为此年应该就是伐纣之年。尤曼、江涛计算的第 40次回归的近日点与他们不同,在公元前 1059年 12月 3.66376日[6],彭瓞钧的《古代和现代的行星天文学》,据此将伐纣之年定在公元前 1059年 12月。其后,张钰哲、张培瑜采用了尤曼等人的计算结果,但仍坚持公元前 1057年为克商之年的结论,认为"岁在鹑火"、"五星聚"、"彗星出"很可能是前后出现的,而被后人附会在一起。

美国学者班大为的《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认为,早期中国"在分野理论中由朱鸟星座占据的天区与周王朝有关",在"征兆观念中,五星聚会与王朝更替具有必然的联系"。他根据黄一农的计算,在公元前的二千年中有 24次五星聚会,其中公元前 1953年和 1059年的两次五星聚会,分别聚于 4度和 7度的范围之内。今本《竹书纪年》云,帝辛末年"五星聚于房,有大赤乌聚于周社";《逸周书·小开》云,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月食。班氏定文王三十五年为公元前 1065年 3月 13日,而公元前 1059年的五星聚,恰在文王四十一年,与文献相符。五星分别聚会在四象中相邻的三个宫(冬、秋、夏),天命降于夏商周三代。而文献中三代有玄、白、赤三种"正色",与冬宫、秋宫、夏宫正相对应,证明"自然力的相互联系的顺序正是三代的正色所反映的顺序",公元前 1576和 1059年两次五星聚恰与商、周的建立有关。

刘启益的《文王受命至成王五年年表》,将《周语》的"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和《世经》的"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作为重要的判据,定文王受命之年为公元前 1082年、武王克商为公元前 1070年。根据张培瑜的推算,公元前 1150至 1000年的 150年中,符合克商之年的岁在鹑火有 12次,其中第 6次是 1082年,第 7次是 1070年,与刘说相符。刘氏还认为,《世经》"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和《世经》引《武成》"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中的三个历日,与张培瑜历表完全符合(刘氏持定点说,以既死霸为朔)。

《诗·小雅·十月之交》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又食之,亦孔之丑。"这一带有日食的历日,对于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有重要意义。但诸家由此得到的结论却相去甚远。僧一行《大衍术日蚀议》、郭守敬《议交食》、王夫之《诗经稗疏》、朱文鑫《历代日食考》、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均定此年为幽王六年。日本平山清次博士对此年作了推算,认为这次日食中国看不到,只有幽王元年(前 780)和平王三十六年(前 734)的两次日食可以看见,而前者发生在夏正四月,与《诗》意不符,后者发生在夏正十月,正合《诗》意,故定为平王三十六年。德国学者郝威烈《诗经日蚀的年日》、日本学者能田忠亮《关于诗经之日蚀》、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均同其说。

李仲超的《对武王克商年份的更正——兼论夏商周年代》,推定西周积年为 363年,克商之年为公元前 1071年,也依据了天象方面的材料。李氏认为,

《春秋元命苞》云“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房者,苍龙之精,周据而兴”,是文王受命称王时的天象,“房”是周的分野,公元前 1078年的五星聚,正好是其所推的文王受命五年,即“改正朔,布王号”之年。李氏认为,《逸周书·小开解》“惟三十又五祀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是文王三十五年正月望日丙子发生的月食,当公元前 1089年。由此推得公元前 1070年为克商之年,此年岁在鹑火。

(五)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依据的诸说

《竹书纪年》本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西晋太康年间在汲郡古墓出土,曾经当时学者整理,其后亡佚。清有朱右曾辑本《汲冢纪年存真》,后有王国维重辑本《竹书纪年辑校》,是为古本。明人范钦所刻《竹书纪年》为今本。钱大昕、章宗源、王国维等均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作。

今本《竹书纪年》云:“武王灭殷,岁在庚寅。二十四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美国学者倪德卫的《西周之年历》认为,今本《竹书纪年》的“庚寅”,相当于公元前 1050年,恰与《尚书·武成》和《逸周书·世俘》所记灭殷的年月日相合。因此,今本《竹书纪年》中的西周年历,“不可能是后来伪造者的‘发明’,而必然是一套早在周末或汉初便已为学者所熟知的年历”。

关于武王的死年,《尚书·金縢》、《史记·周本纪》系于武王 14年,今本《竹书纪年》却在 17年,滞后 3年。夏含夷的《竹书纪年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认为,今本《竹书纪年》保存了 1700年以前墓本的可信资料。今本《竹书纪年》武王年纪“十五年肃慎氏来宾”以下 40字为错简,抽去后,则武王崩陟的记载与十四年直接相接,可知原本记载武王亡于十四年,即十二年克商后二年,恰好与《金縢》、《作洛解》以及《史记》、《管子》、《淮南子》相符。夏含夷将克商之年定为公元前 1045年。

《竹书纪年》云,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但是,在推求克商之年时,此 257年究竟应该加于哪一王之前,学者间却颇有异说。梁启超以周平王元年(前 770),加上此 257年,得公元前 1027年,作为克商之年。雷海宗《殷周年代考》、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同其说。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认为古人每每以幽、厉并称,故《竹书纪年》此语之幽王实为厉王,所以将 257年加于共和元年(前 841)之前,得 1098年,再加成王 6年、武王 7年,得公元前 1111年,以为克商之年。姜文奎《西周年代考》认为,所谓“灭殷”,是指成王 7年,成周营作既成,迁殷顽民于此,所以应将此 257年加在幽王元年(前 781)之前,得公元前 1038年,再加成王 6年、武王 7年,得公元前 1051年,是为克商之年。

(六)证诸文献、金文历日的诸说

《尚书》等文献及金文多载伐纣的历日朏魄,学者多以两者相互证验,以推求克商之年。章鸿钊的《武王克殷年考》认为,《竹书纪年》“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的“庚寅”二字,“必为《竹书》原文”,以《孟子·公孙丑》“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一语考之,此庚寅当公元前 1051年。如从太阴元始年(前 366年)为甲寅计之,则公元前 1050年为庚寅。以此为前提,再求出离此年最近的“岁在鹑火”之年,合以《周书》朏魄日名,可知以公元前 1045与 1055之可能性为最大。然后,以王公在位年数与铜器历日验之,确定公元前 1055年为克商之年。章氏推得周显王三年(前 366年)为元始甲寅年。①

周法高的《西周年代新考——论金文月相与西周王年》,根据四分术来安排年、月、月相、干支俱全的所有铜器,对列王年代作了调整,又对古文《武成》及《召诰》、《洛诰》《顾命》《毕命》中的年、月、月相、干支与其所作历谱作了对照,考定公元前 1045年为克商之年。

马承源的《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根据金文中年、月、月相、干支俱全的 52件铜器来推算金文月相的相对幅度,然后提出自己的金文合历,并推断王世,从而得出克商之年为公元前 1105年的结论。

何幼琦《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以《小盂鼎》和《庚嬴鼎》为康王时器,推算两器的历日干支,得公元前 1013年为康王元年。以此为基点,根据《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判定成、康二世的积年为四十至四十五、六年。又以《洛诰》、《召诰》为周公摄政七年的作品,推得成王元年为公元前 1030年。认为《周本纪》的“十二年二月”当作“十二月正月甲子”,伐纣之年为公元前 1039年。

丁山《周武王克殷日历》认为,“武王十一年庚

① 此甲寅年即《淮南子·天文训》“太阴元始建于甲寅”之年。新城新藏推定此年为周显王四年,即公元前 365年。

寅 , 周始伐商" ,"十一年"下本当有"十二月"三字 , "庚寅"为周师初发的吉日 ,而非指年。自庚寅顺数十七日得丙午 ,即古文《泰誓》"惟丙午 ,王逮师";越十有三日为戊午 ,即《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 ,师毕渡盟津"。今本《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 ,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之"二月" ,与《泰誓》之十二月乖违 ,必为后人增窜。伐纣之年为公元前 1030年。

赵光贤的《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认为 , 《召诰》、《洛诰》皆作于周公摄政七年 ,又用张培瑜所定《历表》与诰中所记"惟二月既望"、"来三月丙午朏"等历日 ,以及古本《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尚书。顾命》的"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惟四月乙未日"、"惟四月哉生魄"等历日对照 ,发现"无一不合"。此外 ,他还以 50件年代比较清楚的铜器 ,分配给共和以前诸王 ,再以铭文中的历日与张表对照 ,也都完全相符 ,证明公元前 1045年确为克商之年。

二、武王克商之年何以纠缠千载

两千年来 ,中外学者为解决武王克商之年 ,可谓殚精竭虑 ,但是问题不仅没有解决 ,结论反而益形歧异 ,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史料真伪难辨。先秦史料传世较少 ,而且真伪杂糅 ,难有定说。研究者每每各执一端 ,不及其余。如古本《竹书纪年》出土于西晋 ,其可信性似乎无可置喙。梁启超据此得出 1027说 ,雷海宗、莫非斯、高本汉、陈梦家、郭沫若、屈万里、何炳棣等均从其说 ,成为本世纪影响最大的克商之年说。但是 ,《竹书纪年》的原简大约在永嘉之乱时即已亡佚 ,初释本屡经传抄、翻刻 ,已出现若干错误 ,如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 ,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即是证明。古书记殷商总积年 ,或云四百 ,或云五百 ,或云六百 ,绝无超过七百者。《殷本纪》载 ,盘庚迁殷后历八世十二王 , 已为甲骨研究所证明。若盘庚迁殷后的积年为 773年 ,则平均王年当在 60年以上 ,其误显见 ,故学者改为"二百七十三年" ,较近于是。古本《竹书纪年》云西周积年为 257年 ,也缺乏旁证 ,未必可信。

今本《竹书纪年》的文字与束晳、刘知几等所引 , 多有不同。竹书原简于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 ,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 ,而书春秋、战国均用周王纪年 , "此例起于紫阳《纲目》,唐以前无此式也。"[7]故钱大昕、王国维等均判其为伪书。是书有关商周的纪年多不可信 ,据《无逸》,祖甲以后诸王 (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等),"罔或克寿 ,或十年 ,或七八年 , 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而今本《竹书纪年》所记 ,廪辛为 4年 ,康丁为 8年 ,武乙为 35年 ,文丁为 13年 ,帝乙为 9年。帝辛为 51年。除廪辛、康丁、帝乙外 ,其余诸王年数都偏长 ,与《无逸》不谐。张培瑜先生见告 ,经长期研究 ,他发现今本《竹书纪年》的历法 ,是用大衍历推定的 ,可见其出至少晚于唐。

文献所见西周积年不仅记载粗略 ,而且彼此歧异 ,莫衷一是。如《左传》宣公三年云: "成王定鼎于郏 ,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孟子。公孙丑》云: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孟子。尽心》下云: "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凭借如此约数 ,自然无法得出精确的克商之年。《世经》云周代积年为 867年 ,而此年数是与刘歆用三统历推算的三代年表对应的 ,全然不可相信。《鲁世家》所记鲁公世系缺伯禽纪年 ,刘歆《世经》所记鲁公纪年虽完整无缺 ,但有三位鲁公的年代与《鲁世家》歧异 ,所以仍无法使用。诸家对文献所缺王公年代 ,多有补正 ,但大多出于推测 ,有较大的随意性 ,缺乏强证。此外 ,所谓"周年" ,其起始点如何确定 ,也颇有争议。《左传》明言始于"成王定鼎于郏" ,而纬书等多始于文王受命。周的终年 ,或以为在东周君亡 ,或以为在秦始皇元年。加之武王以下诸王之年多不确定 ,掺杂的问题极为复杂 ,如武王是否冒文王之年? 周公摄政是否单独纪年? 等等。所以各家所得西周积年 ,也是千差万别 ,如新城新藏为 296年[8],丁山为 259年 ,董作宾为 341年 ,谢元震为 357年。

第二是古代历法不明。相当多的学者试图通过古历来推求克商年 ,但是他们所凭借的历法都不可靠。《汉书。律历志》云 ,春秋末年 ,"史官丧纪 ,畴人弟子分散 ,或在四夷 ,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此即所谓"古六历"。据研究 ,古六历同属四分蔀历 ,法数基本相同 ,朔策为 29. 53085日 ,都偏长 ,乃战国时代托名古昔而作 ,并非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实际使用的历法。用古六历推求三代年表 ,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结果 ,主要是各自的历元不同 (如殷历为甲寅元 ,周历为丁巳元 ,颛顼历为乙卯元),而不是古六历本身有精粗之别。

刘歆的三统历是八十一分历 ,是比四分历更为先进的历法 ,可惜并不精密 ,其朔策为 29. 530864日 ,比古六历还长 ,所以每 300年左右先天一日。此

外,相关的天文推算也比较粗疏,如刘歆认为岁星144年超一辰,实际上是70年超一辰,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后汉书·律历志》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历稍后天,朔先历,朔或在晦,月[或朔]现。”唐一行用三统历推算太初至开元800余年之朔日,已经后天三日,若“推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失之盖益甚矣。”[9]一行的大衍历比三统历精确,但他没有采用古度来测算,而且他对既生霸、既死霸等月相的理解与刘歆一样错误,其结论仍不能为大家普遍接受。姚文田用的颛顼历,与殷历的历元与推步的起点(一为立春,一为冬至)虽然不同,但朔策等基本法数是相同的,因此,其推步的误差也大体相同,都先天两天。

有些学者意识到古六历不合天,试图通过自撰的历谱来推求克商年,但殷周之际历法的基本要素尚不清楚,如岁首是建子还是建寅?月首在朏还是朔?置闰于岁末还是年中?既生魄、既死魄等月相词语的正确含义究竟是什么?等等,学界无不聚讼纷如。因此,至今无一成功者。如新城新藏自作西周历谱(前1149—前723),又根据王国维的月相四分说,推定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66年。丁山也自作《周武王克殷日历》,结合西周积年为257年之说,推定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30年,但其历谱比三统历更粗疏,至先天四日,结论也就可想而知。

学者多以干支推算年代,但干支六十年轮流一周,因此同一干支纪年呈现周期性的重复,如殷历所定克商年为公元前1170年,或说当为公元前1130年,多出60甲子,比刘歆的1122年还要早8年。一行所推克商年为公元前1111年,或说当为公元前1051年庚寅,也是相距一甲子。

有关伐纣的天象资料,文献时有所见,如利簋的“岁鼎”,《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淮南子·兵略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殷人授其柄。”《春秋元命苞》:“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御览》引)”《国语·周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但是,这些天象是当时的实录,还是出于后人的推算,迄今尚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第三,研究者多不作总体研究。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涉及文献研究、铜器断代、历法推步、甲骨分期、考古发掘等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研究者限于学力,大多只能就其中一二个学科立说,因而其研究结论难以覆盖全局。其次,研究者往往着力于解决某一年代点,或某一段时期的年代点,而不能顾及三代的年代点,典型的例子是梁启超。梁氏提出的公元前1027年克商,不过是孤立的年代,他并不考虑武王以下的诸王年代能否安排、以及如何安排的问题。若如其说,则自武王至共和元年之间的10王之年仅186年,而据文献,成、康在位至少40年,穆王在位55年,厉王至少30年。如此,其余六王仅有60年,难以分配,也难以将为数众多的西周诸王的铜器排入。此外,公元前1027年与《武成》等文献所载历日天象几乎完全不能相合。有鉴于此,一些赞成梁说的学者也不得不在公元前1027年附近寻找符合文献记载的克商之年,以为权错。有些学者虽然排定了西周历王的年代,但很少考虑是否与诸如甲骨文日月食年代在内的殷商年代相匹配。或者虽然计算了甲骨文日月食的年代,但并不留意是否与考古地层的测年相吻合。也就是说,在某一或某一组年代点提出后,没有用其他学科的资料或者研究成果来加以验证。

因此,要真正解决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必须联合历史学、天文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测年技术学等学科的学者联合攻关。国家“九五”重大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正是鉴于这一认识而实施的,对此作了有益的实践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0]

参考文献:

[1]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 武王克商之年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本文所引论著,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出于此书.
[2]汉书·律历志[M].
[3]旧唐书·律志[M].
[4]《新唐书·历志》引.
[5]《史记·周本纪》集解引.
[6]尤曼, 江涛. 哈雷彗星的长期运动[J]. 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刊, 1981, 197.
[7]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 卷十三, 竹书纪年[M].
[8]新城新藏. 周初之年代[M].
[9]旧唐书·历志[M].
[10]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R].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10.

(下转第44页)

1977,(8).
[5]于省吾. 甲骨文字释林。释鼎龙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6]左太冲. 吴都赋李善注. 文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7]郭店楚墓竹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8]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 [M]. 上十四部.
[9]张政烺. 洛阳考古四十年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10]游国恩. 离骚纂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1]史记。天官书 [M].
[12]甲骨文合集 [M]. 614, 9648, 9659, 33241.
[13]唐兰. 关于岁星 [N]. 中央日报, 1939-10-29.
[14]史记。周本纪 [M].
[15]大戴礼记。用兵 [M].
[16]国语。周语三 [M].
[17]国语。周语三 [M].
[18]黄盛璋. 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 [J]. 文物, 1978,(6).
[19]张亚初.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A Complimentary Examination on Sui Ding Ke Wen

ZHANG Yong-sh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fact that Sui Xing (the Year Star) in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 was simply named Sui, had been definitely found in the relevant records in oracles and documents. The term Ding (鼎) in its antique form was "zhen" (贞) and this might be found also in many corresponding instanc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Pre-Qin and Han period, the word "Ding" (鼎)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Dang" (rightly) and "Zhen" as Dang or Zhang (exactly on). Hence "Sui Ding (Zhen) ke hun (wen) su you Shang" (岁鼎(贞)克昏(闻)夙有商) is to say that while the Year Star shone just on the north-east, arrived the news of triumph over the Shang forces.

Key Words Sui Ding; ke hun (wen); Li; you shi

(上接第 41页)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Year of the Conquest of Shang by King Wu

PENG 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year of King Wu's conquest over Shang is the key to the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scholars at all times a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made in-depth explorations into this issue, and come to 44 different conclusions, which form a fierce dispute over this issue. With the start of the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 one of the country's key proj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ts ninth "five-year" plan, the research on the year of King Wu's conquest over Shang has once agai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ata they have cited and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y have employed in research, this article has classified various research results into six categories, and carried out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o each category.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has also made tentative explanation on why the year of King Wu's conquest over Shang has remained disputable and unresolved.

Key Words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King Wu's conquest over Shang; chronology; bronze in chronology